

● 钟 涛 著

雅与俗的跨越

汉魏六朝及元代文学论集

巴蜀书社

I206.2/325

雅与俗的跨越

——汉魏六朝及元代文学论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SB05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与俗的跨越:汉魏六朝及元代文学论集/钟涛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1.3
ISBN 7-80659-255-5

I. 雅… II. 钟…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汉魏六朝时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550 号

策划组稿:汪启明
责任编辑:周道贵
封面设计:李文金
责任校对:李 嘉

雅与俗的跨越

——汉魏六朝与元代文学论集

钟 涛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

开本 850×1168 1/32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印张 9

字数 250 千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255-5/I·98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聂石樵

钟涛同志是我的学生。一直以来，她的学术兴趣主要是在汉魏六朝诗文和六朝文化的研究上。本书收录的有关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论文，正是这种学术倾向的反映。近几年，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她的学术研究范围有所拓展，向前溯源到先秦散文，向后则涉猎到元曲。本书中收录的几篇有关元曲的研究论文，大约就是为了反映近两年她在古代文学研究兴趣上的一些变化吧。

术业有专攻，治学者关注某一时代的文学，集中精力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作断代研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本书收录的汉魏六朝诗文研究的论文，既有对汉魏六朝诗文的总体观照，也不乏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细致把握，还涉及到一些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注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以及汉魏六朝文学独特的文化背景。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汉魏六朝文学和文化的一种特别热爱。当然，青年人治学虽不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但也应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不应在学术研究中划地为牢，局限于一隅。钟涛开始跳出对六朝文采风流的迷醉，注意到其他时代文学现象的丰富多彩，应当说是在学术研究中对自己的一次超越。

从几年前出版的她的博士论文《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就可看出，钟涛对文学的文体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特殊兴趣，这本论文集仍然有这个特点。比如关于元曲的几篇论文，或是有

关元曲曲体形成的研究，或是有关元曲文化传播的研究，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都没有脱离开元曲本体及其生存的文化环境。

这本书是钟涛这几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小结。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作者正值年富力强，相信她能继续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在未来的岁月，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2001年1月

自序

本书是我的一部论文集，共收论文26篇，约二十余万字。收录了我近年来所写的有关汉魏六朝文学和元代文学研究的部分论文，大多已公开发表过，也有少数是首次发表。

本书名为《雅与俗的跨越》，既是作者对汉魏六朝诗文和元杂剧文学性质和审美倾向的一种认识，也是作者学术认知和研究兴趣发生变化的一个反映。

用“雅”来概括八代文学，虽不是一个最好的措辞，但也约略近似。从诗、赋、文的作者和接受者来看，这个时期主要都集中在贵族和文人士大夫阶层。西汉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是宫廷文学和藩国文学圈，东汉开始逐渐形成士族文学圈。此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主要作者和受众都以宫廷贵族和士族文人为主。八代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雅文化背景，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在审美趣味上的雅化特征。在八代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赋和文在审美趣味和艺术形式上，趋雅的倾向都十分明显，骈文和骈赋的逐渐成熟，就是最好的标志。八代乐府民歌等的创作，固然说明这一时期不乏俗文学，但如郊庙歌辞之类的乐府诗，本身仍属雅文化的范畴。这一时期盛行的文人拟作乐府诗，其实也是对乐府诗的一个雅化过程。从两汉文学的宗经征圣，讽谏言志，到六朝文学的玄音山水，摇荡性灵，八代文学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题材内容，主流都是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学。而充斥于八代文学中的繁藻丽辞、隶事声律等，正是文学上追求唯美雅化的艺

术表现。

元代诗文仍然与传统雅文学一脉相承。但被誉为一代文学典范的元曲，却和传统诗文迥异其趣，具有趋俗的特征。元曲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俗”，已被不少研究者所认同。但我认为，元曲尤其是元杂剧的“俗”，不仅仅是语言和艺术上的通俗，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作者和受众，不再像过去以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主，它的多数作者是下层社会的市民文人，它的主要受众是社会上的普通大众。元杂剧之“俗”，和出现在诗文创作中的平易浅俗诗风，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标志着唐宋以来涌动在民间的通俗文学创作，逐渐进入了我国主流文学创作的殿堂。元杂剧的大众文化特点，不仅和传统诗文截然不同，而且和明清时期的文人戏剧创作也不一样。明清时期，传奇作家及其作品，都在向传统雅文学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汉魏六朝诗文一直是我研究兴趣之所在。两汉经传的宏阔气象，六朝美文的焕然文采，都曾令我深深陶醉。已出版的博士论文《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就是我关于六朝骈文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近两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开始作一些元曲研究。骈文和杂剧，虽然都是十分讲求形式的文学样式，但文化背景和审美倾向存在着很大差异，观照这两种文学形式，使我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小书中所收的这两类论文，还只是一些研究尝试，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巴蜀书社一向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慨然应允出版本书，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2001年1月于京华

目 录

序	聂石樵 (1)
自序	(3)
西汉的文学和经学	(1)
论《汉书》传记的结构艺术	(13)
论《汉书》的语言风格	(23)
从《霍光传》看《汉书》的人物塑造	(31)
先唐书牋文论略	(40)
论六朝骈体书牋文	(52)
《文选》录文倾向性之具体考察	(62)
《文选》和《文心雕龙》“笔”之比较	(71)
任昉骈文略论	(84)
论徐陵骈文与其政治生活的关系	(95)
古诗在魏晋南北朝接受状况述略	(102)
论南朝诗的审美意象	(113)
论孙绰的文学成就	(124)
从陶诗显晦看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观念之走向	(133)
“休鲍”体发微	(142)
萧悫诗简论	(153)

名僧与东晋文学·····	(162)
萧梁皇族与梁代文学·····	(173)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	
——南朝后期文学文风的转变及其意义·····	(186)
梁季入北文人述略·····	(196)
刘知几《汉书》研究评议·····	(207)
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看张溥的文学思想 ·····	(216)
元曲曲体的形成新论·····	(227)
试论元人的曲本位观念·····	(238)
试论元曲作家的现代意义·····	(248)
元曲艺术生产价值的再认识·····	(266)

西汉的文学和经学

—

作为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是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连绵不绝，长达二千余年之久。可以说，经学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因此，要研究封建时代中国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离不开对“经学”的研究。然而，纵观中国历史，经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真正确立其统治地位，经学思想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最为直接，经学思想最接近纯正的时代，莫过于西汉。从汉武帝用公孙弘为相开始，“通经”就成了“致仕”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仅有很多宰相出自经生，即使朝廷诏令及群臣奏议，也无不援引经传以为依据。朝廷立有经学博士，学校教育及科举选拔也都以经学为基本内容。更有甚者，经学还直接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诸如以《春秋》决狱^②，以《禹贡》治河^③，以《洪范》察变^④，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⑤。经学不仅成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成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许多行为的具体准则。即从学术文化上看，经学的兴盛和发展，也自然带动和影响了其他学术的兴盛和发达，以致我国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认为：

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⑥。

西汉是经今文学的昌明时期。自从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今文经学就成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因为其所尊之儒术，即今文经学。文帝立一经博士，武帝则立五经博士，终其汉世十四博士，皆为今文博士。这不仅以其先出，更重要的还在于，经今文学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应运而生。尤其是《春秋公羊传》所倡导的微言大义、大一统、阴阳灾异等思想，更投统治者之所好，而为其竭力倡导得以日隆，所以，《春秋公羊传》也就在所立诸经传中地位最显，影响也最大。质言之，研究汉代之经学思想对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其实主要是研究今文经学思想，特别是“公羊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⑦因此，汉代的文学，必然也会与当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经学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的关系^⑧，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也就不像对其他学科的影响那么明显，而是表现得更为隐晦，也更为曲折而已。也正因为此，人们历来对经学与文学间微妙关系的研究很不措意，尤其是西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学与文学，似乎还不曾有人揭示过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笔者正是有感于此，不揣浅陋，拟就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二

西汉经学思想大致经历了逐步发展、确立正统地位、臻于极盛这样三个阶段。因而，其对文学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太明显，逐渐趋向明朗，最终形成了经学家即文学家的发展历程。

我们知道，汉初的几十年，是黄老思想的天下。产生于先秦时代的经学，在汉初，经过秦始皇的焚书灭学之后，缓慢复苏。这是因为，秦末的苛政，持续多年的亡秦战争、楚汉战争、以及汉高祖刘邦消除异姓王的战争，造成了汉初经济的极度困顿局面。此正如《汉书·食货志上》云：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汉初统治者采取“约法省禁”^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其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至萧何、曹参相继为相，他们也正是黄老之学的信奉者，因而采取了“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⑩的政策治理国家。这样一来，则治经的儒生“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乃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⑪尽管惠帝时已废“挟书之律”，文帝时已立经学博士，但直到景帝时，窦太后尚称儒家著述为“司空城旦书”^⑫由此可见，经学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远不如黄老之学的影响大。历数汉初几十年的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中，经学思想的影响甚微。如邹阳、枚乘诸家，主要是上承战国诸子遗风为文，而颇称较著的贾谊，虽说曾修《春秋左氏传》^⑬，因而成为古文经《左传》的最早传人之一。但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与其谓受经学思想的影响，毋宁说主要是受黄老思想和屈原精神的孕育和滋养。以他的代表作《鹏鸟赋》为例，这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堪称汉初文学中并不多见的力作之一。其中

坦露的，也不过是道家万物永远处于循环反复的变化之中的观点，充满着“纵躯委命”、“德人无累，知命不忧”之类解脱精神痛苦后的达观。继贾谊之后，淮南群臣可算是汉代文学之壁垒重镇。仅《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就有赋 82 篇，淮南群臣赋 44 篇，又有《淮南子》一书。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大多都已亡佚。我们只能从《招隐士》、《淮南子》中，约略窥见当时文学学术的盛况了。《淮南子》是思想倾向偏于道家的杂家著述，正显示出汉初学术是上承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余绪的特点。至于《招隐士》，则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做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的产儿。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准备阶段，经学思想投统治者之所好，渐渐取黄老之学而代之，最终登上了定为一尊的历史舞台，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汉书·董仲舒传》云：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董仲舒乃《春秋》公羊学之大儒。正是在他的竭力倡导、推波助澜下，汉武帝才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的。于建元五年兴太学，置五经博士。至此，经学思想才被统治阶级正式定为统治思想。但是也应当看到，从汉武帝到汉宣帝的几十年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只不过是把经学当作一种统治策略，一种牢笼士人的方式而已。其实，在其内心深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崇奉儒学。所谓的“外儒内法”，才道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思想的真相。例如，汉宣帝曾谆谆告诫其子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而且欲废好儒的太子爽，立“明察好法”的淮阳王为太子。这些才是他们真实的心理与面目。

正是由于经学当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几乎无可避免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正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自有其“汉家制度”，

经学思想的影响还更多地体现在外在的形式的方面，而没有真正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而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在受经学思想影响的同时，还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它的局限，而保留着自己思想的独特个性。这里，我们试以当时最伟大的史传文学家司马迁为例对这种状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通经的。他曾先后师事孔安国、董仲舒等经学大师。其父司马谈精通《易》学，想来对他也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史记》一书中，孔子、董仲舒之类儒学大师的言论，往往被作者司马迁作为一种衡量是非、判断事理的标准加以徵引。《史记》不仅大量取材于儒家传统的“六艺”，而且直接取法于所谓的“《春秋》笔法”。更不用说经学思想对其全书思想体系的影响了。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经学思想的浸染也是相当显著的。

首先，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这部伟大的史传文学巨著时，有一种直接继承周公、孔子之业的自我意识。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这简直就是以五百年后的又一个孔子自居了。

其次，司马迁在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时，并不完全是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熔铸进了作者自己的情感与爱憎。正是由于这一点，《史记》才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这种在历史著作的字里行间融进作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情感爱憎的写法，也正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史记》的贡献在于，它成功地发展了这种创作方法，从用个别字词寓褒贬的狭隘手法完善为一种深广而又充分地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创作方法。我们说，《史记》在塑造人物及行文之间

那种堪称一绝的隐晦的讽刺艺术，固然主要得力于作者非凡的胆识和悲惨的身世遭际，但也不能说《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史记·匈奴列传·赞》）的特殊写法对他毫无影响。《春秋》“推见至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的含蓄手法，表现在《史记》中，则是司马迁对许多当代人物几乎不易觉察的讽刺艺术。总之，《史记》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决非无源之流，无根之萍，而是在前人成就基础上的深化和扩展。其中，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语言艺术的运用、结构方式的处理，经传对其具有深刻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没有被当时已经盛行的经学思想所局限。还保留着自己的独特的创作个性。这种创作个性表现在，与儒家传统“中和美”的理想相对的一种“爱奇”的审美风格渗透全书，而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相矛盾的激越跌宕的“怨”与“愤”的情感随处可见。

然而，自司马迁以后，西汉文学家中，再也没有如此伟大而又独特的天才出现了。直到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元帝好儒”（《汉书·儒林传》），崇奉儒学才由一种权术和利用，变成了一种真诚的笃信。至此，儒学独尊的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这时候，官方重视的也不再是那杂以怪异而气势恢宏的《公羊》学，而是提倡温柔敦厚的《诗》学了。这是因为，西汉王朝这时已开始走下坡路，作为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西汉文学，再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武、宣盛世孕育下的那种激扬蹈厉、意气奋发的宏文佳构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毫无例外地同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似乎也没有人能跳出经学思想的樊篱而另辟蹊径了。当时文坛之萃萃大者，如刘向、刘歆，是经学家兼文学家；而扬雄，则又是文学家兼经学家。仅以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扬雄为例，在他的著述中，有仿《周易》的《太玄》、仿《论语》的《法言》。即使他的纯文学创作，其受经传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那些抒情言志的赋作，所抒发的情感也完全是一个儒士的情感。而

像《甘泉》、《长扬》、《羽猎》等赋作中对皇帝奢侈腐化、骄奢淫逸生活的讽谕，不过是《诗经》美刺观念的充分而完备的发挥罢了。更不用说，他赋作中大量袭用的经传成语了。显然，在扬雄那里，经学与文学已到了完全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地步了。

三

上文我们讨论了西汉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学家的影响。那么，经学与西汉文学的类型与特质又具有怎样一种关系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西汉文学的主要类型是什么。在先秦曾显得辉煌灿烂的诗歌，在西汉则大大地沉寂了。汉乐府民歌无论是典籍记载的，还是经由其他方式流传下来的，能确认为西汉作品的也非常少。给西汉在文学史上以地位的，是汉文和汉赋。从严格的文学意义上说，是史传文学和骋辞大赋。这就是西汉文学的主要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便是气势的雄浑与结构的宏大。西汉文学这种类型和特质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经学的影响，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王正月”时，开宗明义：“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进一步阐发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释道：“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汉是继秦之后又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秦朝短祚而亡，而汉初先是异姓诸侯，后是同姓诸侯，间有叛乱发生。朝廷真正完全统治全国，则是景帝削平七王之乱以后。因此，《春秋》大一统的观点，正是被统治者作为政治统一的依据而受到重视。这种观点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润色鸿业、铺排摛扬、歌颂朝廷和中央集权的汉大赋，便是《史记》那种略古详今，为西汉当代人物画像立传的煌煌巨著。可以想见，在那个“兵革不休，士民罢敝”（《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

代，人民渴望大一统，正如大旱之望云霓。因而，大一统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那么，讴歌大一统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就具有其价值。这样，我们对司马相如这类汉赋大家，也就应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了。

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不过，从他因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相如这一点来看，他所读之书未必全是经传。但是，从他临死之前尚撰一卷书言封禅之事看，他又毫无疑问地受到了经学的影响。现存司马相如最重要的、同时又是西汉大赋的代表作品，便是其《子虚赋》和《上林赋》。《子虚赋》假设子虚与乌有先生的对话，以齐、楚对比，批评楚的“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上林赋》则说亡是公之言，极力夸张上林苑的建构之阔大，气势之恢宏以及游猎之壮观。我们如果将这两篇赋合起来看，则张大天子威势，压倒藩国诸侯的意思非常明显。《上林赋》作于汉武帝之时。其时，大一统的观念不仅仅表现在经学著作中，而且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作者对中央集权歌功颂德的思想根源也就显而易见了。而他赋作中那种囊括一切的气势，一泻千里的铺排，藻彩摛文的华丽词章，又恰恰正是那统一强盛、生机勃勃的大汉帝国的形象的反映和生动写照。

东汉的《公羊》学大家何休认为，《公羊传》有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公羊解诂序》），的确道出了《公羊传》的特点。我们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公羊传》对汉代文学以至整个汉代文化的浪漫特质具有一定的影响。

《春秋》三传之中，《左传》是古文经学，在当时还只是在民间流传。《穀梁传》是鲁学，“非常谨愿而很少夸张”^⑤，而且直到汉宣帝时，方被立于学官。作为齐学的《公羊传》，不仅立学官早，而且影响也大。在我国古代文化系统中，“齐、楚的文化是一系”^⑥。西汉文化是直承楚文化而来的。因此，西汉文学的直接源头即是屈、宋的楚辞。可以说，贯注于西汉文学核心